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六期／民國 99 年 12 月／頁 71～110

歐元歷史：分析層次的觀點

李俊毅*、羅至美**

摘　要

本文擬提供一個歐元的歷史回顧，並繼之以相關理論的檢視。歐元是歐洲在實現經濟暨貨幣聯盟上若干嘗試的結果。儘管其從開始到獲採用的過程大致可分爲三階段，但就其高低起伏的解釋，卻仍是爭辯的焦點。爲求更好的理解歐元，本文以「分析層次」作爲組織與評估相關詮釋的架構。各理論觀點依其解釋力可分別歸類爲國際、歐洲或國家三層次。儘管在後設層次或不相容，合起來它們卻構成了一個更全面的圖像。此外，此一架構亦使理論的評估不致取決於特定且本非價值中立的「事實」，而是視其能否納入不同層次的要素。最後，儘管因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解釋尚不可得，而使部分學者主張折衷主義，本文卻持懷疑的態度：前者得出的或僅是片斷的資訊，而非知識。

關鍵詞：歐元、經濟暨貨幣聯盟、分析層次

*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isiajylee@ccu.edu.tw。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E-mail: cmluo@mail.ntpu.edu.tw。
收稿日期：99 年 8 月 18 日；通過日期：99 年 12 月 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本文旨在從歷史與理論兩方面，探討歐元的演進與發展。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歐洲單一貨幣「歐元」正式於歐盟十一個會員國中開始啓用。到二〇一〇年爲止，已有十六個歐盟會員國加入歐元，形成一個多達三億兩千七百萬人口的「歐元區」（Eurozone or euro area）。[1] 歐元區之外，則另有若干非歐元會員國－包括歐盟當中的非歐元會員國、歐盟的候選與潛在會員國，諸多非洲國家與俄羅斯聯邦等－係採盯住歐元匯率的貨幣政策（European Central Bank, 2010: 29-30）。在國際經貿層次，二〇〇九年底的資料顯示，以歐元計價的債券占國際債券市場（狹義，即歐元區居住民發行而由歐元區居住民持有衡量）存量的 31.4%；在跨國借貸與存款市場上以歐元計價者分別占 20.3% 及 22.0%；以全球外匯準備持有貨幣而言，歐元持有的比重占 27.4%（美元則占 62.1%），是次於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y）（European Central Bank, 2010: 11-12）。[2] 雖然在許多面向上歐元仍不足以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但確實已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國際貨幣。

除了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貨幣之外，歐元也是歐洲統合的經驗裡的一項重大成就。單一貨幣的意義與重要性是多元且複雜的。在經濟方面，經濟體之間匯率波動的穩定，無論是透過國家間政策的協調，或是交由一個超國家的組織，都能鼓勵貿易與投資的產生，因而長久以來即是歐洲國家的重要政策目標之一。在政治方面，歐元也有象徵歐盟的功能，甚至被視爲邁向政治統合的重要步驟。二〇〇二年一項歐盟執委會的民調指出，當問及想到歐盟時的意義與個人感覺，半數受訪者想到「在歐盟內旅遊、就學

[1] 當前歐元區共有 16 個會員國，這包括 11 個創始會員國：比利時、德國、西班牙、法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奧地利、葡萄牙、芬蘭。希臘於 2001 年、斯洛文尼亞於 2007 年、賽浦路斯與馬爾它於 2008 年、斯洛伐克於 2009 年分別加入歐元。其他尚未加入歐元、但表示一旦符合加入標準將加入的歐盟會員國爲：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波蘭與羅馬尼亞。丹麥、瑞典與英國則選擇不加入歐元。

[2] 關於歐元的國際經濟地位之解析，參見洪德欽（2006）；李顯峰（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就業的自由」，49% 想到歐元，近三成受訪者則認爲歐盟代表的是和平（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53）。可見歐元已是歐盟的一個重要符號，長遠而言將可能有重大的政治與社會意義。當然，除了正面的利益與成就之外，單一貨幣的實施亦有其代價。貨幣政策牽涉到分配問題，因此國內不同經濟部門對貨幣聯盟與單一貨幣的立場，往往有顯著的差異。對許多人而言，貨幣聯盟與單一貨幣更表示國家主權的限制與讓渡，[3] 因爲國家必須將貨幣政策－例如，以匯率政策干預市場－的決策權轉移到「歐洲中央銀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此外，因發行歐元而導致原有國家貨幣的消失，也多少意味著對國家認同的傷害。單一貨幣的成立，因此是歐洲國家克服諸多困難的結果。

如何解釋歐洲國家願意讓渡貨幣主權，發行單一貨幣？這在學界仍是爭議不休的一項議題。歐洲統合的研究有若干主流但涇渭分明的理論傳統，諸如（新）功能論、（自由）政府間主義、不同取向的制度論等等。[4] 然而以歐元與「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下將以 EMU 稱之）爲主題的文獻，往往並不從這些傳統出發，而是以個案特殊性的方式提出解釋。國內探討歐洲統合理論的文獻不在少數，分析歐元相關議題的資料亦所在多有，但結合相關統合理論與 EMU 歷史的論述則較爲少見（如黃偉峰，2000；王啓明，2002；張亞中，1998）。[5] 對於歐元以及其據以成形的 EMU 之討論，多數作品或作歷史與制度面的回顧（施建生，2001；王啓明等，2009；王泰銓，1997）、或探討歐元的制度與組織運作、對國際金融貿易的影響，以及我國的因應之道等（洪德欽，1999、2006；蘇導民，1999、2000；李顯峰、符勇，2001；沈玄池，1998）。本文嘗試填補此一落差，組織並整理若干關於 EMU 與歐元的理論解釋。當然，相關的文獻十分豐富多元，遠非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處理，因此勢

[3] 自由政府間主義者 Andrew Moravcsik (1993) 則持相反的主張，認爲此舉反而強化了國家的自主性。

[4] 關於這些理論途徑的發展與相互關係，可參見 Rosamond (2000)；Jachtenfuchs (2001)。

[5] 然而黃偉峰（2000）僅以歐元爲例探討「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在方法論上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並未申論歐元的歷史能否或如何由此一途徑解釋；張亞中（1998：165-206）主張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成立，體現了超國家主義的深化，但並未直接探究其間的因果連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必有所取捨與簡化。

本文的討論將分兩大部分進行。第二節回顧歐元的歷史發展。歐元迄今雖僅有十年多的歷史，但它的發展卻必須從歐體/歐盟國家在經濟與貨幣聯盟此項議題的嘗試與進程加以理解。既有文獻對於歷史的描述常有偏重程度不一的現象，不同作者對同一議題的歷史解釋亦往往有顯著差異。[6] 這顯示出歷史並非客觀中立的存在；相反的，歷史事實的組織與詮釋，總是涉及觀察者的觀點與假設。本節的歷史回顧因而並不宣稱提供一個完整的敘事，而僅作爲後續討論與分析的基礎。[7] 在歷史的分期上，本文則依循歐盟本身對歐元歷史的理解，分成三個階段進行討論。

第三節則是歷史的解釋與理論評述。本文擬以「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的概念做爲理解與組織相關文獻的方式。作爲國際關係學門中的一項重要方法論議題，分析層次關切「解釋特定分析對象的行爲時，不同層次的因果因素之相對重要性」（Wendt, 1991: 387）。[8] 若以國家爲分析單位，其對外行爲可從國際結構的限制或國內政治（包括不同決策模型）的因素加以檢視。以歐元爲分析對象，則既有文獻往往在國際、歐盟與國家等三個層次的因素中，偏好某一層次的解釋，而降低、甚至忽視其他層次的因素之重要性。這是說，儘管在事實層面上我們或能同意，一個事件的發生或政策的產出是多重因果的，涉及諸如行爲者的理性考量、角色限制、其所處的種種國內或國際政治、經濟與知識脈絡等因素，此一認知對於理論與知識的獲得卻沒有太大助益，因爲如此一來，一個個案僅是依其獨特性與歷史特殊性而解釋。將不同的理論觀點依其主要解釋層次加以整理，一方面可以凸顯出特定層次的長處與限制，另一方面則可使不同層次的理論得以相互比較。這絕非主張大雜燴式的理論整合，而毋寧是以分析層次作爲一個架構，「將看似不相容的理論架構，呈現爲從不同角度考察

---

6 例如，Dyson (1994) 主張馬斯垂克條約對於 EMU 的設計與認可，德國的勢力是一個重要因素。此一觀點則爲 Sandholtz (1993) 駁斥。

7 本文因而對歷史的客觀性，以及人們是否能中立、直接的攫取歷史「眞相」，持懷疑的態度。此一立場的說明，可參見 Jenkins (1991)。影響所及，儘管史料十分重要，史實與理論的契合，卻不是評價理論解釋的唯一標準。後文將進一步討論。

8 分析層次的討論與其重要性，參見 Singer (1961)；Wight (2006: 102-118)；宋學文（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項議題的相容論點」（Sadeh & Verdun, 2009: 278）。[9] 本節的第一部分將以三個解釋層次的方式討論若干重要文獻，第二部分則以此爲基礎，針對理論解釋的面向進一步評述。

第四節則是結論，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

貳、歷史發展

本節擬從三個階段探討經濟與貨幣聯盟與歐元的發展。單一貨幣的意義之一是會員國間不再有匯率波動的問題，因而在討論歐元的歷史之前，宜對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與國際資本流動的關係稍作說明。這方面一個有用的概念是經濟學裡的「Mundell-Fleming 模型」（Mundell, 1963；Fleming, 1962）。簡單來說，此模型勾勒了當資本市場逐漸整合、資本流動量增加時，國內政策選項與多邊匯率合作的關係：在任何一個時間點，決策者只能在「自由資本流動」、「固定匯率機制」以及「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三個政策選項中選擇兩個。舉例而言，若比利時決定以貨幣政策刺激成長或就業，則其將放寬國家貨幣政策並降息；利率的調降會使投資者將資金移出比國市場到較高利率的地方，從而拋售比國貨幣；資本外移的結果將引發國際收支的赤字，而導致比利時法郎貶值的壓力；該國央行因而被迫進場干預，以買進比利時法郎以及賣出外國貨幣的方式維持匯率的固定；然而，此舉將造成貨幣供給的緊縮，它將解除起初擴張政策的效果，並使利率回到原先的水準。只有在資本流動程度低，以及投資者不傾向將資金在數國市場間移動的情況下，此一循環過程方能被減弱。另一個選項則是棄守匯率的穩定，以達到原先追求的政策目標（McNamara, 1998: 44-45）。

Mundell-Fleming 模型有助於理解自主貨幣政策與固定匯率的關係，但並無法解釋何以歐洲國家在面對國際資本流動時，會追求固定匯率或自主的貨幣政策。以歐洲的經驗來說，歐洲國家在一九七〇年代施行「蛇形浮動機制」時最終選擇自主的貨幣政策，而使 EMU 宣告失敗，在歐洲貨幣

[9] 以不同分析層次探討 EMU 的作品並不少見，可參見 Frieden & Jones (1998)；Underhill (2002)；Verdun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系時期則大致追求固定匯率，並延續到 EMU 的成立。相對的，美國與日本在面臨國際資本流入時，卻能採行浮動的匯率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McNamara, 1998: 6）。[10] 這顯示出單就國際經貿的變遷，並不足以解釋歐洲的經濟與貨幣整合；經濟與貨幣整合，從而是政治的決定。本節將進行歷史的簡單回顧，而將其解釋留待第三節討論。

一、羅馬條約～「魏納報告」（一九五八～七〇）

於一九五七年簽署、並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以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的羅馬條約，並未有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概念。條約第一百零三條至一百零九條提到經濟與貨幣政策的「諮詢」與「協調」，第一百零五條則設立「貨幣委員會」，由各國央行與財政部會代表以及兩名執委會代表組成，一方面負責檢視會員國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貨幣與金融情勢，一方面可自行、或應理事會或執委會之請求，提出建議（*EEC Treaty*, 1957: Articles 103-9；Verdun, 2000: 50-52）。羅馬條約固然鼓吹共同市場與關稅聯盟的成立，反映出會員國對增進彼此互賴程度的認可，但並未有將貨幣政策置於一個中央機構管轄的想法，因此亦無制度化的發展。

從「羅馬條約」到一九六九年貨幣聯盟想法首度被提出的這段期間，關於貨幣政策方面的嘗試曾數度被提出：一九五九年一月，歐洲議會提議成立一個類似美國聯邦準備體系的機制；一九六〇年美國貨幣專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歐洲基金的構想，用以確保國際流通性，並減低不穩定性帶來的危機；此一計畫於一九六二年爲莫內（Jean Monnet）的「歐洲合眾國行動委員會」（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採納；一九五九年比利時外長維尼（Pierre Wigny）呼籲設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記帳單位以取代美元，從而確保歐洲金融的獨立。執委會在促進經濟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方面，亦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除了起草若干建議之外，包括前述貨幣委員會在內，執委會共成立了五個相關的委員會；其更在一九六五年將歐洲經濟共同體貨幣的發行，接納爲一個主要的戰略目標

[10] 這方面的政治分析，參見 Andrews (1994)，將於後文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soukalis, 1977: 52-73；Verdun, 2000: 52-53）。然而，這些初步的嘗試，都沒有在制度上有具體的成果。

一九六六年以後，美國政府採取貨幣擴張政策而引起美國的通膨與貿易赤字，進而引起國際間對美元、甚至整個「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信心危機。在詹森與尼克森「善意的忽略」（benign neglect）政策下，歐洲與日本需要承擔干預匯率的衝擊，並需調整其政策以維持「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安定。德國馬克的升值與法國法郎的貶值，危及彼時歐洲統合的主要成就之一—「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共同物價體系。一九六八至六九年二月間，執委會共出版三份備忘錄以回應這些國際事件，主張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貿易模式已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匯率因而應成爲共同的利益考量。第三份備忘錄－又稱「貝耶報告」（the Barre Report）－是執委會建議將歐洲統合的範疇擴張到經濟與貨幣面向的第一次嘗試。在此基礎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海牙峰會批准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提案。然而，有鑑於各國對 EMU 的實現看法不一，一九七〇年三月經濟及財政部長理事會責成時任盧森堡總理暨財政部長的魏納（Pierre Werner）主持一個委員會，負責研究並草擬 EMU 的具體方案。同年五月，該委員會提出「魏納過渡報告」（Werner Interim Report），建議以三階段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報告中的 EMU 有兩大目標：第一，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第二，在對外關係上，逐步形成一個有機的經濟與貨幣協會，擁有其個體性，使歐洲能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報告承認得到工會、工商聯合總會等社會伙伴支持的重要性，而主張共同體與這些社會經濟部門的團體之間，其觀點應獲得一致（Henning, 1998: 553-554；Verdun, 2000: 55-57）。

儘管有相當的共識，過渡報告卻有一個重大的歧見：德國、義大利與荷蘭持「經濟優先」（Economists）的立場，主張經濟政策的高度協調與趨同，是貨幣整合－包括不可逆的固定匯率、共同貨幣與共同貨幣政策等－的一個主要前提條件；相對的，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與執委會則持「貨幣優先」（Monetarists）的立場，認爲必須先發展強健的貨幣制度架構，方能促進各國間經濟政策的趨同（Apel, 1998: 32-33）。這是兩個不相容的觀點，因此一九七〇年五月的理事會決議，魏納委員會應於同年九月提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階段整合的內容。一九七〇年十月，後者提出最後的報告（Werner Report），提出以十年分三階段完成 EMU 的計畫，對第一階段有較明確的規範，對後續的階段則持開放的態度。至於經濟與貨幣何者優先的爭論，則採「平行論」（parallelism）的途徑，同時進行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匯率波動幅度的限縮。此一折衷與妥協事實上並未解決二者之間的對立，而僅是綜合兩者的訴求（Apel, 1998: 33-34）。

「魏納報告」裡的 EMU 有五大目標（Werner Report, 1970: 9-10）：

1. 建立一個商品、服務，人民以及資本能自由流通，但沒有競爭扭曲的區域，且不因此導致結構性或區域性的失衡；
2. 促進社會福利，並減少區域與社會的不均。爲此，報告中指出除市場力量的運作之外，亦需諮詢經濟與社會團體。
3. 建構貨幣聯盟，達到貨幣完全及不可逆之兌換性、匯率波動幅度之泯除、不可撤銷之固定匯率，以及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
4. 僅有共同體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全球收支才具重要性。亦即希望藉由境內公、私部門對於生產與金融要素的流動，達成整體的均衡，一如民族國家。
5. 將決策責任由會員國轉移到共同體的層次：貨幣政策的決策權將集中化，經濟政策方面則部分將仍由會員國負責。

在組織方面，「魏納報告」建議成立「經濟政策決策中心」（Centre of Decision for Economic Policy），以至少提出三個關於共同體經濟狀況的年度報告方式，促成共同綱領的採納，達到經濟政策的協調。此外，報告亦建議至少於第二階段成立「歐洲貨幣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作爲第三階段將成立的「歐體中央銀行體系」（Community System of Central Banks）之前身（Verdun, 2000: 59-60）。

此一報告在一九七〇年十月獲執委會接受，但消去了最後將轉移主權的字眼。然而，在十一月的部長理事會中，該報告卻無法得到一致的同意，因荷蘭與德國強調超國家條款的設置，而這是法國無法接受的。一九七一年一月，德、法達成協議：EMU 中關於貨幣與經濟的規定將持續四年，而若進入第二階段的協議無法達成，貨幣機制將停止適用。在此基礎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年三月理事會正式宣告 EMU 的成立（Apel, 1998: 31-33；Verdun, 2000: 60-61）。

二、一九七〇年代～歐洲貨幣體系

「魏納報告」的設計從未被完全實現過。德、義、荷與法、比、盧之間的歧異無法消除，國際情勢也對 EMU 不利。一九七一年五月，美國遭遇戰後第一次貿易赤字，但尼克森政府並不緊縮其貨幣政策，反而降息試圖以此刺激經濟成長。這導致資本流向歐洲，爲歐洲（尤其是德國）帶來龐大的升值壓力。當投機者攻擊德國馬克時，德國政府須選擇升值馬克或浮動利率，而最終決定後者。德國央行呼籲行政的介入，而法國則認爲此舉不符共同經濟體的政策，以推遲 EMU 計畫至同年底的方式回應，希冀屆時危機已解除。同年八月，美國尼克森政府宣佈終止「布列敦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的匯兌關係，拒絕爲美元的匯率負責。面對美國政策轉變，歐洲各國的反應不一，無法達成政策的協調，最終演變爲 EEC 國家貨幣之間（荷、比、盧三國除外）匯率的浮動。EMU 的目標因此成爲無法達到的理想（Henning, 1998: 554-555）。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大工業國聚會協商貨幣危機的解決，在其後達成的「史密松寧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中，美國與歐體國家協定，歐體各國對美金的匯率波動限制在 4.5%（上下 2.25%）。然而，由於此一幅度對共同農業政策而言仍舊過大，歐體各國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另行約定，將其之間的匯率波動則限制在 2.25%（上下 1.125%）之內。此即所謂「蛇形浮動」機制，又稱「隧道裡的蛇」（snake in the tunnel）：隧道意指歐體貨幣對美金較大的波動幅度，蛇則指歐體各國之間的幅度。

「蛇形浮動機制」成形後，一度在政治上被賦予貨幣統一的象徵。這是因爲此一歐洲的措施不僅度過了「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的危機，也在一九七二年五月接納英國、丹麥、愛爾蘭與挪威四國（Verdun, 2000: 68）。一九七三年四月執委會更重提將於一九八〇年完成 EMU 的目標。然而，EMU 終究無法持續發展：經濟與貨幣整合孰者優先的歧見無法解決，一九七三、七四年一系列的國際貨幣危機，更暴露出各國在面對危機時，往往因各自的經濟問題與政策目標，而無法有效做成政策的協調。一九七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二、三月間，美元再度貶值，資本流動轉向歐洲，歐體各國起初雖試圖採取措施因應，但終無法承受壓力。同年五月，部長理事會在德法達成協議後，決定讓「蛇」對美金自由浮動；蛇離開了隧道。十月石油危機爆發後，各國雖同受打擊，但需因應的問題不同－德國試著維持供需的平衡、荷比盧三國與丹麥一方面需減低通貨膨脹，一方面需避免由此而來的出口衰退、法國則主要面臨失業的問題與生產（Katzenstein, 1978；McNamara, 1998: 115-116；Verdun, 2000: 70）。這不僅意味著各國偏好自主的貨幣政策，更意味著而他們無法在 EMU 的第二階段上取得共識。一九七四年一月法國離開「蛇形浮動機制」，作爲主張貨幣優先最力的國家，其離開也象徵了 EMU 的死亡（Verdun, 2000: 70），僅留下德國、荷蘭與比利時留在機制裡（有時候亦包括丹麥），形成一個「馬克區」（D-mark zone）。

儘管「蛇形浮動機制」宣告失敗，歐體各國並未將匯率協定摒除在議程之外。一九七七年十月，時任歐體執委會主席的詹金斯（Roy Jenkins）呼籲，在歐洲統合陷入停滯時，重啓貨幣聯盟的努力是最爲適切的，因爲貨幣政策涉及的失業率與通膨等問題，是各國所共同關心的。對德國而言，一九七七年美元相對於馬克貶值了 23.5%，爲德國帶來龐大的升值壓力，也引起後者對於出口競爭力、貿易收益以及失業率的擔憂。由於彼此皆認爲美國的政策是失當的，重啓貨幣聯盟的提議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哥本哈根召開的歐洲峰會裡被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與法國總理季斯卡（V. Giscard d'Estaing）接受。此二者成爲後來「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的主要推手，他們不僅在高峰會上說服其他領袖一個新的歐洲匯率機制的可能性、呼籲正式展開相關計畫的研究，另以非體制內的方式提出「歐洲貨幣體系」的草案。同年六月的布萊梅峰會決定了「歐洲貨幣體系」的主要機制。十二月的布魯塞爾峰會正式簽署成立「歐洲貨幣體系」，但實際的運作則因法國內部的問題而延至一九七九年三月。「歐洲貨幣體系」的成員國包括德、荷、比、盧、法、義、丹麥與愛爾蘭。英國雖加入「歐洲貨幣體系」，但並未參與後者的「匯率機制」（McNamara, 1998: 123-128；Verdun, 2000: 76-78）。

「歐洲貨幣體系」的設計包含以下特點（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6；McNamara, 1998: 126-127；Verdun, 2000: 78-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歐洲通貨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由歐洲投資銀行管理，採用一籃通貨。以「歐洲通貨單位」爲參考標準，會員國貨幣與「歐洲通貨單位」之間建立中心匯率，前者必須釘住中心匯率作匯價的浮動。
2. 「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類似「蛇形浮動機制」。以「歐洲通貨單位」爲基礎，各國匯率的浮動範圍限制在上下 2.25% 之內。之前未參加「蛇形浮動機制」的國家如義大利，則獲允一個上下 6% 的浮動範圍直到其經濟條件允許（Apel, 1998: 56）。
3. 「分離指標或乖離率」（divergence indicator）：儘管「歐洲貨幣體系」由德、法主導，但兩造並非毫無歧見。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弱勢貨幣（法、義）相對於強勢貨幣（德、荷）往往需要付出較大的外匯存底代價，以使其能留在固定匯率機制之內；相對的，強勢貨幣國則擔心，若各國需介入的義務是相等的，則對其而言將帶來通貨膨脹。「分離指標」的設計即爲了解決此一爭議：它計算出匯率偏移中心匯率的程度，從而發出國家需要進行干預的信號，無論是強勢或弱勢貨幣。
4. 國家自主權的（部分）讓渡：匯率的改變需要透過會員國與執委會的雙邊協議爲之。

各界對「歐洲貨幣體系」的運作一開始並不看好，認爲其將重蹈「蛇形機制」的覆轍。在七九至八三年間前者的運作亦不順利，匯率屢經重新調整（Apel, 1998: 78, table A2.10），但隨著八三年法國在遇到貶值壓力下，仍選擇留在「匯率機制」而非退出（Henning, 1998: 559-561），「歐洲貨幣體系」開始穩定，而持續到一九九二年中。九二年國際投機客攻擊英鎊與里拉，迫使英國與義大利退出，象徵「歐洲貨幣體系」的結束。就持續的時間來看，以及和「蛇形機制」相較，「歐洲貨幣體系」毋寧是成功的。

三、一九八〇年代～馬斯垂克條約

一九八六年簽訂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 SE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決議在一九九二年底完成單一市場。[11] 一九八五至八八年間，美國面臨龐大的貿易赤字，而帶給歐洲國家龐大的升值壓力。以此爲背景，法德兩國提議進一步的區域合作。在一九八八年六月的漢諾威高峰會中，國家或政府領袖指出，「因採行單一市場，會員國確認進一步發展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目標」。該次會議並決議，將由時任執委會主席的狄諾（Jacques Delors）擔任研究經濟暨貨幣聯盟委員會的主席，負責研究並提案有關於實現該聯盟的階段，並於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馬德里峰會中加以討論（Henning, 1998: 563-564；Verdun, 2000: 82-83）。一九八九年四月，「狄諾報告」出爐，提議以三階段逐步實現一個人員、商品、服務與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區域、會員國間不可逆的固定匯率，以及最終的單一貨幣。

「魏納報告」與「狄諾報告」相較，二者有若干相似之處：首先，二者都建議以三階段的方式完成 EMU；其次，二者皆區分經濟聯盟與貨幣聯盟；第三，經濟優先與貨幣優先的爭論仍舊存在，「狄諾報告」亦試圖以平行論的方式解決衝突，強調二者需同時且逐步的發展，唯在組織設計方面，「狄諾報告」建議設立集權化的歐洲組織負責貨幣政策，在經濟政策上則無相應的提議（Delors Report, 1989；Verdun, 2000: 19-20, 85）。

「狄諾報告」起初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交由財政部長理事會討論，而獲得除英國外的一致同意。在六月的馬德里峰會中，由於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對於喪失主權的疑慮，峰會僅作成採納「狄諾報告」建議的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作爲第一階段開始的結論，且儘管確認將召開「政府間會議」（IGCs），卻未設立明確的時間。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柏林圍牆倒塌。同年十二月的史特拉斯堡峰會，則決定於次年十二月召開兩個政府間會議以修改羅馬條約：一個關於經濟暨貨幣聯盟，另一則關於政治聯盟。前者的進行頗爲順利，並收到各國政府、「歐洲工會聯合會」（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以及「歐洲工業與雇主聯盟」（Union of Industrial and Employers' Confederations of Europe）等團體的提案。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德國統一。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各國政府與國家領袖聚集於荷蘭南部的馬斯垂克，決議一年以來政府間會議的結論（Verdun, 2000: 82-91）。該

[11] 關於單一歐洲法案，可參見 George & Bache (2001: 114-121)；Apel, (1998: 7-8, 7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次峰會簽訂了「歐盟條約」（馬斯垂克條約），其中與 EMU 有關的重點如下（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7-8；Levitt & Lord, 2000: 80-87）：

1. 分三階段實現 EMU：
   (1) 第一階段（一九九〇至九四）：完成內部市場，並透過財政與預算政策的協調減低既有的差異；各國應加入「匯率機制」；修改「羅馬條約」以便能在未來成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ESCB），該體系將包括各國央行，以及一個新的共同銀行－「歐洲中央銀行」。
   (2) 第二階段（一九九四至九九）：設立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基本組織與架構；強化各國的協調與團結；成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但經濟與貿易政策的決策仍由國家當局決定；設立「歐洲貨幣機構」（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EMI），作爲歐洲中央銀行的前身。
   (3) 第三階段（一九九九以降）：匯率的完全固定與轉換；各國貨幣終將被單一貨幣取代；「歐洲中央銀行」將承擔做成並執行歐盟貨幣政策的責任。特別的是，條約載明，「歐洲中央銀行」將獨立於政治控制，不得尋求或接受「歐盟的建制或團體、任何會員國政府或任何團體」的指揮，並以「物價穩定」爲其主要目標。
2. 關於 EMU 的時程：若多數國家屆時已滿足「趨同標準」（convergence criteria），則 EMU 的第三階段可於一九九七年提早實施；若否，它將於一九九九年自動於已符合這些標準的國家開始實行。
3. 「趨同標準」包括：
   (1) 物價穩定方面：通貨膨脹不得超過通膨率最低的三個國家平均值之 1.5%；
   (2)「健全的財政」（sound public finances）：政府赤字不得超過 GDP 的 3%；
   (3)「可持續的財政」（sustainable public finances）：政府公債不得超過 GDP 的 60%；
   (4) 一致性的持續：長期利率不得超過長期利率最低的三個國家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均值之 2%；

(5) 匯率穩定：必須參與匯率機制達兩年，且利率沒有重大的波動。

4. 一個國家是否符合「趨同標準」，將於一九九六年的峰會由歐盟領袖以「條件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 vote）的方式決定。
5. 「歐洲中央銀行」將於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或至少在單一貨幣生效前六個月成立。
6. 針對 EMU 以及馬斯垂克條約的社會篇章，英國被給予「選擇性退出條款」（opt-out clause）；丹麥的公投若未過，則其亦豁免參與第三階段。

馬斯垂克條約簽訂後，出乎意外地引起公眾的反對，進而引發九二至九三年的「匯率機制危機」（ERM crises）。丹麥公民於九二年六月以公民投票否決該約，八月底的法國民調亦顯示，公投的結果恐不樂觀。由於條約需經全體會員國批准始能生效，這兩個事例在歐洲形成一股不樂觀的氣氛，儘管最後九月底的法國公投以極小差距通過馬斯垂克條約。此外，統一後的德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問題，促使德國央行維持較高的利率，而這對有蕭條與失業問題的會員國而言，將帶來重新調整匯率的壓力（Apel, 1998: 106-112；Levitt & Lord, 2000: 64-66）。加上當時的美國亦採取極低的利率政策，這些事件爲歐洲的貨幣市場帶來極大的亂流（Henning, 1998: 565）。九月，投機客攻擊義大利里拉與英國英鎊，迫使英國與義大利宣布退出「匯率機制」。其後，愛爾蘭、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貨幣相繼貶值；芬蘭、瑞典與挪威也相繼決定不再盯住「歐洲貨幣單位」。九三年五月，丹麥民眾在退出條款的保證下，公投通過馬斯垂克條約。但市場仍遇到沈重的投機客攻擊，尤其是針對法國法郎。在德、法聯手干預未果的情況下，一九九三年八月部長理事會決定將「匯率機制」的波幅由上下 2.25% 放寬到上下 15%（Verdun, 2000: 92-95）。然而，這些危機並沒有停住 EMU 的發展。一九九三年十月，德國憲法法庭判決，德國簽訂馬斯垂克條約並不違憲，使德國成爲最後一個批准馬約的國家；馬斯垂克條約於九三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陳麗娟，2008：10）。

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EMU 的主要發展如下：一九九四年「歐洲貨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構」成立，作爲「歐洲中央銀行」的前身，其負責貨幣政策的協調，以及處理單一貨幣發行的細節；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馬德里歐洲高峰會議，決定以歐元作爲共同貨幣的名稱；一九九六年，歐洲貨幣機構提出歐元紙鈔與硬幣的設計；一九九七年阿姆斯特丹歐洲高峰會議通過「穩定與成長公約」（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SGP），約束會員國在財政赤字與公債上的上限；九八年五月，十一個會員國符合「趨同標準」，成爲歐元區的第一波會員，英國與丹麥則選擇不加入；「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與「歐洲中央銀行」成立。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EMU 第三階段開始（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9-10）。

參、理論辯論：歐元演進與發展的層次分析

一、理論檢視

以下本文將從不同層次討論歐元演進與發展的可能原因。在此，國際層次指涉 EMU 與歐元所處的全球脈絡，具體表現在國際經貿秩序的穩定與否、國際經貿與科技的發展，以及冷戰結束後的權力結構等面向。歐盟層次則包含了概念與思潮的變遷、歐洲的政治、功能與制度結構等因素。國家層次的因素，則涉及會員國的國家利益與議價能力，表現在政府與領袖的行爲上。

㈠國際層次

1. 國際貨幣體系

從國際關係而非歐洲研究的視角出發，則吾人可由「建制」（regime）的概念探討 EMU。根據「霸權穩定論」（e.g. Gilpin, 1987），國際體系的穩定需要一個具支配地位的國家有意願與能力行使其影響力，以維持主要國家間的互動規則或秩序。由此來看，若霸權國家無意或不能維持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則將刺激其他區域性國際建制之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的過程，因此可從美國的經濟與貨幣政策加以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察。

「魏納報告」、乃至歐洲經濟與貨幣整合的嘗試，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有密切的關係。布列敦森林會議於一九四四年在美國新罕布夏州召開，成員包括美國以及大多數非共世界的國家，其目的則是建立戰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以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布列敦森林會議決議成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內的組織。後者的會員國必須將其貨幣與美元維持在一固定的比例（上下各 1% 的浮動幅度），美元與黃金的價格亦維持固定（一盎司黃金定價爲三十五美元），且匯率一旦決定就不能隨意更改，除非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的核准。此外，「國際貨幣基金」亦提供資金，協助國家改善短期國際收支赤字。因爲滿足於此穩定的匯率機制，歐體國家在統合初期並沒有動機發展屬於自己的匯率機制（Apel, 1998: 24-25；McNamara, 1998: 72-75）。「一九五七年，當〔羅馬〕條約簽訂時，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脈絡下建立獨立貨幣體系的構想，似乎是無法想像的」（Tsoukalis, 1977: 52）。

由於各國採盯緊美元的策略，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是唯一有實力與意願的霸權，「美國聯邦準備體系成爲世界的銀行家，美元也成爲世界貨幣體系的基礎」（Gilpin, 1987: 133）。美國的貨幣政策因此動輒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匯率以及整體經濟發展。Henning 據此提出其論點，認爲美國對國際體系的擾亂與否，將影響歐洲國家在匯率以及貨幣政策方面展開區域性合作的動機。當支配地位的國家（美國）提供體系穩定性時，小國（如歐洲國家）將滿足於現狀；反之，當支配國持續干擾體系，小國將以區域的方式尋求貨幣的穩定（Henning, 1998: 538）。循此，其識別出四個相對穩定時期以及七個干擾的事件，而得出美國動搖體系和歐洲 EMU 的發展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的結論（Henning, 1998: 566）。

由此來解釋三次貨幣整合的嘗試：一九六〇年代詹森與尼克森「善意的忽略」，促使歐洲國家思考整合的可能性，而有「魏納報告」的出現。就「蛇形機制」發展的期間而言，一九七一年美國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關係，放棄了「布列敦森林體系」，此一破壞體系的作爲最終使歐洲國家和美國達成「史密松寧協定」，並促成了「蛇形浮動機制」的形成；美國於七三年放任美元貶值，最後導致各國對美元的自由浮動，但其彼此間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固定匯率仍舊存在（隧道被移除了，但蛇仍然存在）；相對的，一九七四至七六年這段時間「蛇形機制」的鬆散以及統合運動的停滯，則反映出美國福特政府緊縮其總體經濟政策，以及不強迫伙伴國採擴張政策的傾向（Henning, 1998: 554-557）。

就「歐洲貨幣體系」的期間來看，美元貶值所帶來的升值壓力，是德國願意建立貨幣體系的重要原因。除了國內經濟表現的考量之外，美元的疲弱與美國政策的不穩定，也使德國馬克日益可能成爲一個外匯持有貨幣，而增加德國央行在貨幣控制上的難度。就此而言，歐洲匯率的穩定，以及「歐洲通貨單位」的設計，將能避免馬克在德國境外被大量持有（Henning, 1998: 557-558）。最後，針對「狄諾報告」的發生，Henning 指出，八五至八八年美國雷根與布希政府要求歐洲貨幣（尤其是德國馬克）升值的壓力，是德、法於八八年呼籲進一步展開經濟暨貨幣整合的原因。美元疲弱固然是造成一九九二至三年間「匯率機制危機」的原因之一，但這也使歐洲國家更願意透過共同的機制解決問題（1998：563-565）。以集體的力量強化對美國以及日本的壓力，是整合的重要考量之一（Verdun, 2000: 86）。

儘管上述的分析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不無問題存在。首先，美國對體系的干預與否，影響的不只是歐洲國家。然而，何以僅在歐洲有經濟暨貨幣整合的嘗試？若干區域層次的特殊性因而需要納入考量。其次，Henning 對「歐洲貨幣體系」成立的解釋，偏重在德國立場的解析。對於另一個主導國法國，則認爲由於彼時的法國（以及英國和義大利）是赤字國，能從德國馬克的升值獲利，因而傾向贊同美國的立場（1998：558-559）。當美國於一九八六年特別要求德國採行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時，法國和英國則選擇支持德國。相似結構性（美國）壓力，何以會造成歐洲國家不同的行爲？美國政策與歐洲統合之間具因果關係，或許是個過強的宣稱。影響歐洲國家行爲的，仍是各國的政治決定，即使這些決定是以經濟理由表述。就此而言，Sadeh & Verdun (2009: 279) 所述，「橫越大西洋的緊張關係，形成了一九七八至八一年間『歐洲貨幣體系』建立的背景」，或許是較爲適切的說法；美國的政策變化，提供了歐洲國家參與統合的動機與脈絡，但實際的決策與行爲，則需由其他因素解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全球資本流動

與 Henning 的途徑相似，Andrews (1994) 亦強調國際結構，但其出發點則是偏向經濟的。[12] 以 Mundell-Fleming 的模型爲基礎，其認爲資本流動的發展，來自於通訊與資訊科技的進步、金融公司的跨國境發展、以及國內市場自由化三項變遷。這些沿革不是政府能完全掌控，因而可被視爲是獨立的結構性限制，影響國家的行爲，而表現在總體經濟政策上。在競爭壓力與決策當局社會化的過程中，結構性的限制會偏好特定政策而懲罰其他選項。其結果則是國家政策行爲的趨同。

在 EMU 發展的歷史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在「歐洲貨幣體系」建立的前後，出現了貨幣政策趨同的傾向，亦即各國逐漸放棄以貨幣政策作爲刺激成長的工具，而逐漸學習德國央行維持物價與財政穩定的政策（McNamara, 1998）。在制度層次，「歐洲中央銀行」的設計，無論是置於德國法蘭克福的決定，或是馬斯垂克條約裡，明訂以物價穩定做爲其政策目標，也都有明顯的德國取向。一項可能的解釋因而是，EMU 的設計反映德國的觀點與利益（Dyson, 1994；林欽明，1998: 91）。此一說法爲 Sadeh & Verdun (2009: 281-282) 駁斥，認爲無論就德國央行的態度與能力，德國都無法主導 EMU 的發展。從 Andrews 的分析來看，此一政策的趨同，不必然是德國主導的結果，而是國際結構的限制。換言之，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發展經驗，是因爲在國際資本流動日益成長與自由化的結構性影響下，各國的政策選項受到限制所致（1994：212-213）。

此一結構層面的解釋面臨與 Henning 相似的限制，亦即國際資本流動影響的不僅是歐洲，但卻僅有歐洲出現貨幣整合的嘗試。Andrews (1994: 213) 亦小心的指出，其理論並不主張結構決定論，結構固然會限制國家的選項，但其分配效果卻不是一致的，國家的政策仍會因其偏好、信念，以及與其他國家的相對關係決定。

[12] 此外，Henning 將體系的變動，歸因於美國歷任政府或總統的作爲，其解釋偏重行爲者。以下的討論則將顯示出，Andrews 著重在科技與金融的發展，而這些均非特定行爲者所能解釋。因此，雖然兩者的歸因都是在國際的層次，但其解釋仍有結構－行爲者的差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新現實主義

以上兩個關於國際結構的分析，較偏向政治經濟或經濟面向。國際政治結構的觀點，則將 EMU 的發展，置於冷戰結束引起的歐洲政治局勢－亦即德國統一後的歐洲權力結構－加以觀察。換言之，新德國是否會維持其西方（西歐）的政治、文化取向，或是會片面改變歐洲的秩序？EMU 的成立，乃至於馬斯垂克條約的設計－歐洲共同體、「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以及「司法與內務合作」（*Justice and Home Affairs*）－在此意義下可被看成是約束德國的手段。德國以「歐洲化的德國」取信鄰國，從而化解後者對其統一後國力大增、「德國化歐洲」、甚至可能重蹈兩次世界大戰覆轍的擔憂（吳東野，1998：46），對法國與其他國家而言，「EMU 的設立才是使統一後的德國完全納入歐盟體系中的具體方式，減低統一的德國因東向擴張所引起鄰國疑慮的可能性」（劉復國，1998：2）。此外，貨幣聯盟將成立新的經濟治理機制（歐洲中央銀行），而這意味德國在歐洲經濟政策上領導地位的終止；加入共同貨幣也意味著脫離此一機制的代價－長期經濟混亂的風險－將是很難承受的；最後，缺乏屬於自己的貨幣，一國也難以從事大型的軍事行動（Levitt & Lord, 2000: 55-57；Sandholtz, 1993: 31-34）。[13]

此外，EMU 的協商過程與成立爲新現實主義帶來理論上的挑戰，「何以歐洲聯盟的國家如法國與義大利，會追求 EMU 的成立，而不擔心新德國擴張其權力？」。對此，Grieco 提出「發聲機會說」（voice opportunities），主張一旦國家之間享有共同利益並因此展開制度建立的協商，則「較弱但

[13] 現實主義的解釋，在文獻中是有爭議的。Moravcsik (1998: 346-347) 指出，德國早在地緣政治局勢發生變化之前，即已朝向貨幣聯盟的方向發展，而這說明德國的政策主要出於經濟理性。相反的，Levitt & Lord (2000: 52-53) 則認爲此一反證或嫌矯枉過正，因爲許多德國人將德國馬克因貨幣整合而消失，看成是戰後西德主要成就之一的斲喪。在此情勢下，冷戰的結束與東西德的統一，使德國須調整其對外關係以因應新的地緣政治局勢，便成了支持 EMU 者如總理柯爾的一個有力論點。Segers & van Esch (2007) 則指出，選舉考量、聯邦眾議院（Bundestag）及聯邦參議院（Bundesrat）的支持、行政體系內部的立場與偏好歧異等國內政治因素，增添了取得國內一致性的困難，而使地緣政治的論述顯得重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仍具影響力的國家將試圖確保新建構的規範能提供其足夠的機會，以發表其考量與利益」（Grieco, 1995: 34）。EMU 的成立因此仍能以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解釋：國家的行爲不再（不僅）是權力平衡的結盟政策，而是透過制度的協商與安排，將國家的利益限制或鎖在特定的架構中（cf. Sandholtz, 1993: 27-30）。

新現實主義的解釋，凸顯出 EMU 涉及的不僅只是國家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有更根本的安全與和平之考量。然而其解釋集中在冷戰結束以及馬斯垂克條約此一特定的歷史轉折，難以顧及歐洲國家在此之前的嘗試，尤其是何以德、法這兩個世仇，竟能願意展開統合的動作，是其不足之處。

㈡歐洲層次

前述國際層次的解釋項－無論是美國對體系的干擾與否，或是國際資本流動引起的對國家政策選項的限制－都無法說明何以僅有歐洲有貨幣整合的運動。以歐洲統合的某些特色來理解歐洲經驗的特殊性，因而有其必要。

1. 貿易與「共同農業政策」

貿易與「共同農業政策」是文獻談到歐元的發展時，常列舉出的兩個重要因素，儘管它們往往不被當成整合的最主要機制，而傾向被歸類爲國家所處的背景與脈絡（McNamara, 1998；Moravcsik, 1998；Tsoukalis, 1977；Verdun, 2000）。「共同農業政策」是羅馬條約中明載的四項共同政策之一（其餘爲商品的自由流動，人員、服務與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交通），其重點是歐體農產品價格的標準化，以及維持這些價格的種種機制如內部價格補貼、出口價格補貼，以及對外部第三國的關稅等。「共同農業政策」的運作與匯率息息相關，因爲農產品在歐體境內有相同的價格（先後以美元和「歐洲通貨單位」爲計價標準），匯率的波動因而意味著，以本國貨幣標價的農產品，必須在價格上有相應的變動。農產品價格若大幅上升，則有通貨膨脹之虞：若價格下降，則與農民的利益不符。[14] 匯率的穩定，

[14] 共同農業政策的設計與運作，遠比上述所提複雜，但無法在此深入探討。可參見 Geor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是各國的主要關懷之一。一九六九年法郎對美元貶值 12.5%，德國馬克則升值，威脅「共同農業政策」的運作，是歐洲嘗試穩定匯率的重要背景。

以貿易而言，歐盟的官方資料顯示，比較一九六五年、一九七五年、一九八五年、一九九五年四個時期進出口佔 GDP 的比重，美國進口與出口大約各僅佔其 GDP 的 4.4%～12.9%不等，日本介於 7.3%～14.5%，EC 國家平均則介於 18.7%～31.3%之間（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5: tables 38 and 42, cited in McNamara, 1998: 46），顯示出貿易在歐洲國家 GDP 的比重，遠較美、日爲高。匯率的穩定，因此是前者偏好的政策選項。

此外，就經濟表現而言，八〇年代中期歐洲共同體的經濟成長明顯落後美國與日本，在競爭力落後的危機感及大企業的要求下，決定推動延遲了二十年的歐洲單一市場。會員國期待單一市場的實施與建立，可以爲歐洲企業提供一個可以美、日相比、廣達三億五千萬人口的消費市場，以使歐洲企業亦能享有美、日企業所擁有的規模經濟優勢。然而，在缺乏共同貨幣的環境下，此一單一市場的好處將會被變動的匯率所阻礙，甚至抵銷。因此支持建立單一市場者即認爲，共同的貨幣是單一市場計畫中最後一塊迷失的拼圖（Levitt & Lord, 2000: 14-17）。[15] 經濟學家 Thomasso Padoa-Schioppa (1994: 4) 即認爲，商品與勞務的自由流動、會員國各自保有貨幣政策的決定權、資本的自由流動、與浮動的匯率機制等四者的同時存在，將組成一個不一致的四重奏；缺乏單一貨幣的單一市場，勢將無法存活。歐盟執委會一份評估 EMU 的報告亦指出，建立歐洲貨幣聯盟將使歐洲享有更多但非通膨所引發的經濟成長。其理由在於，貨幣聯盟將帶來匯兌風險與交易手續費的消失，並進一步促進區域內的貿易；而過往面臨強勢德國馬克而屢有貶值風險的歐體會員國，將不必再付出利率風險溢價的成本，從而可鼓勵更多的國內投資。兩者的實現都將有益於經濟成長的促進（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0）。

& Bache (2001: 305-323)；McNamara (1998: 99-103)。

[15] 相關的「功能性外溢」論述亦常出現在歐體／歐盟的官方文獻如 Delors 報告之中，參見 Sandholtz (1993: 19-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述的論點事實上隱含新功能主義的色彩。新功能主義起源於一九六〇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爲 Ernst Haas (1958) 與 Leon Lindberg (1963)，其問題意識在於回答五〇年代開始的歐洲統合運動之本質，並試圖就此發展一個「鉅型理論」（grand theory）。此一嘗試因七〇年代統合運動的停滯而大抵失敗，但又隨著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的統合進程而復興。其主要論點大致如下：[16]

1. 「國家」是個複雜的概念，它並非單一的行爲者。國家利益是由國家政府與其他利益團體經過一連串協商過程的結果。
2. 除了國家之外，利益團體也是國際關係裡重要的行爲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活動往往並不侷限於國家疆界之內，而有跨國界的串連。
3. 非政府行爲者也是國際關係裡的重要行爲者。它指涉的不只是後來新自由主義或跨國主義所強調的跨國公司，更包含國際組織裡的部門。
4. 外溢效應，意指一旦國家政府發起了區域統合，則該統合的過程即有其生命與進程，不但不完全受國家政府的掌控，更會爲了完善其設立的目標而限制會員國家的政策選項。

由此來看，某一部門的整合能夠成功，必然需要其他部門的合作與配合。歐盟的形成因此是由特定經濟部門到整體經濟部門、由經濟領域到政治領域的統合過程。EMU 的發展，因此可從關稅同盟的建立、內部市場的完成、「共同農業政策」的維持等面向來解釋，因爲匯率的穩定，是後者能順利運作之所需。這些功能性與技術性的需求，最終使國家必須予以回應，而在政治與制度層次做出相關的配套，表現在三次關於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嘗試之上。

然而，此一途徑的缺陷亦十分明顯：其能解釋統合的成功，卻無法解釋失敗或停滯的時期，最多僅能將其解釋爲過渡、暫時與不重要的插曲（Sadeh and Verdun, 2009: 283）。舉例而言，吾人可以追問：在「共同農

[16] 關於新功能主義發展的脈絡、歷史與論點，參見 Rosamond (2000: 50-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業政策」與貿易的需求下，何以「蛇形機制」最終仍舊失敗？

2. 思想概念因素

結構層次觀點的主要缺陷是，結構至多只能限制國家行爲的選項，但不能決定國家會採取哪一具體的政策，因爲國家行爲取決於國家對特定結構的詮釋（cf. Ringmar, 1997: 283）。EMU 的歷史從而可由意識形態或思想概念的角度來觀察。經濟與貨幣的整合需要各國政策的協議，而這隱含了至少在決策菁英的層次，發生了認知層次的趨同。[17] McNamara (1998: 54-56) 指出，「布列敦森林體系」不僅安排了一套特定的國際金融秩序，也體現了一套特定的政治與社會安排，亦即學者 John Ruggie (1982) 所稱之「鑲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簡要來說，「鑲嵌的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因爲有鑑於二十世紀初各國的關稅壁壘，「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目的在於鼓勵全球貿易與投資的進行；但另一方面，此一自由主義又與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不同，是鑲嵌在特定的價值之下，亦即主張政府應干預國內經濟，以貨幣政策達到諸如充分就業與刺激成長等政策目標。問題在於，依據 Mundell-Fleming 模型，國家僅能在資本流動性、固定匯率以及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之間選擇兩項。「布列敦森林體系」成形之時，國際的資本流動尚處於相對較低的層次，故該體系能同時追求固定的匯率以及自主的貨幣政策。一旦國際資本流動增加而難以控制（如上述 Andrews 的論點），則國家將必須在自主貨幣政策與固定匯率之間做出抉擇。就此觀之，「魏納報告」與「蛇形機制」的失敗，係因國家選擇前者，而「歐洲貨幣體系」的成立、持續，乃至於馬斯垂克條約的設計，代表國家在概念上的轉變與趨同。

在此一個需回答的問題是，何以歐洲國家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選擇自主的貨幣政策，但在中期以降，則逐漸改採合作的模式？McNamara 主張，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石油危機，可以視爲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各國仍信奉「布列敦森林體系」肇建者凱因斯的觀點，認爲自主的總體經

[17] Sadeh & Verdun (2009) 將概念的轉變歸類在全球層次，但沒有進一步指出此類變遷是否是一個全球的現象，或只是歐洲的局部回應，因此本文暫且將之歸爲歐洲層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濟政策是一個價值，故在石油危機期間，選擇以擴張的貨幣政策解決失業與低成長的問題。然而，此一策略並無法奏效：擴張政策反而帶來通貨膨脹，招來反效果。凱因斯經濟理論隱含的價值觀因而開始鬆動。此時，儘管德國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同受打擊，但其通貨膨脹卻保持在相對低點。德國央行維持物價穩定、強調「健全的貨幣與財政」（'sound' money and finance）的概念與作法，爲其他國家提供了另一個可能性。德國的總體經濟政策開始在一九七〇年代晚期被其他國家接受，而有「政策競爭」（policy emulation）的效果（McNamara, 1998: 152-158）。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開始，低通貨膨脹開始被視爲是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Verdun, 2000: 5）。爲確立並具體落實一信念，EMU 而非鬆散的多邊合作，便成了各國在協商馬斯垂克條約時的合理選項（Sandholtz, 1993: 34-37）。由此途徑觀之，上述關於 EMU 的設計是否反映德國觀點與利益的問題，因而可以得到另一種解釋：此一現象未必是如 Dyson 所稱的，與德國本身的意志與能力有關，也未必是如 Andrews 所指，係因國際結構的限制，而可能是德國總體經濟政策爲其他國家接受、效法的結果。

McNamara 的論點與「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的途徑有近似之處。「知識社群」的概念主要由 Peter Haas 發展，意指「一群專業人士組成之網路，而他們在一議題領域中具有公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並對政策相關的知識享有權威性的發言權」（Haas, 1992: 3）。簡單來說，其對政策的影響依循著「不確定性、詮釋、制度化」的變遷過程：在國際政策協調的場域，國家對於需要相互依賴以達政策目標的議題會產生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將導致對資訊的需求；特定專家或官僚的地位變得重要，因他們能提供科學或技術性的專業知識與建議，對社會或物理現象提供詮釋；這些專業社群因此在國家或跨國層次成爲重要的行爲者，當他們與國家的官僚機構或國際組織的事務單位（secretariats）相互結合，即能發揮影響力，將其概念與想法制度化（Haas, 1992: 3-4）。前述 McNamara「政策競爭」的現象，因此可由「知識社群」的概念加以詮釋：各國中央銀行官員，因其有相似的知識背景與頻繁的互動，使其對貨幣整合的想法易於趨同，並影響制度的擘畫。

McNamara 認爲儘管她的研究部分印證了知識社群的觀點，然而由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者強調特定專業社群的作用，在概念上顯得較爲狹隘。歐盟國家在觀念思想上的趨同，並不完全反映專業社群的想法，而另涉及諸如社會大眾對國家政府的定位等因素（McNamara, 1998: 66-69）。雖然如此，由於這兩個途徑皆強調概念的重要性，其限制亦有類似之處。黃偉峰（2000）即批判採用知識社群此一途徑者，往往預設知識社群成員的存在與其特徵，以此來解釋其政策影響力，有流於主觀之虞，使該途徑無法被否證。就此而言，McNamara 的研究亦有相似的問題：政策的協調固然隱含了思想或意識形態的趨同，然而後者的影響程度究竟爲何？哪些行爲者的轉變才是關鍵？這些恐是需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3. 制度因素

何以在相同的國際結構影響下，其他地區沒有出現類似歐洲的經驗？一個可能的解釋，來自於歐洲統合過程中發展出的種種制度。新制度主義自一九八〇年代起發展，但除了「制度是重要的」此一主軸外，不同學派在理論的假設與建構、制度的定義、以及其如何運作等各方面，有頗大的差異。[18] 爲使討論能夠聚焦，在此將以歷史制度論爲主要代表。後者大抵包含幾項要素（Hall & Taylor, 1996: 937-942；Meunier & McNamara, 2007: 4-7）：

(1) 對於制度與個別行爲之間的關係，採取較寬廣的概念：「計算途徑」強調人類行爲中，工具性與策略性計算的面向；「文化途徑」則強調行爲不完全是策略性的，而受制於世界觀，亦即制度提供的道德與認知樣板。
(2) 制度在發展與運作上，賦予不同社會團體不對稱的權力關係。
(3) 重視「時間性」（temporality）以及「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歷史事件的時序是因果關連的，一個事件可能會有「非預期的效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影響或限制下一個時間

[18] 參見 Rosamond (2000: 113-122)。Hall & Taylor (1996) 區分理性選擇、歷史以及社會三種制度主義，是當前主流的分法。Hay & Wincott (1998) 對於 Hall & Taylor 關於歷史制度論的分析，有進一步的批判。Vivien Schmidt (2008) 則主張加入論述制度論作爲第四種學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的事件；歷史制度論的分析，因而著重在若干「關鍵時機點」（critical juncture）上。

(4) 重視脈絡，制度之間相互重疊與衝突而引發改變，將制度的發展帶往不同的方向。

(5) 除了強調制度之外，亦重視其它因素的解釋力如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觀念或信仰的傳播。

Verdun (2007) 以歷史制度論的角度，將 EMU 的歷史分七個歷史轉折加以詮釋。其重點可整理如下。首先，EMU 概念從無到有的過程，「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穩定與崩解是重要的國際脈絡，關稅同盟的成立以及「共同農業政策」的成功，亦使 EMU 能登上議程。其次，以 EMU 的內容來看，「魏納報告」與「狄諾報告」之間有顯著的相似度，儘管二者所處的時空背景差異甚大，而這反映出路徑依賴的特點。換言之， EMU 的計畫在七〇年代即已開始成形，儘管當時的環境未臻成熟。第三，因此，執委會主席如貝耶、魏納、詹金斯等人、委員會的科技官僚、各國央行官員等，在 EMU 的發展上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儘管他們的提議，仍須國家政府與領袖的支持。第四，外部的衝擊（如兩次石油危機）以及歐洲的制度脈絡－不論是各國國內政治考量，或是歐體／歐盟層次－決定了 EMU 在各階段的命運。舉例而言，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停滯性通膨以及各國分歧的政策，不僅使「魏納報告」無法完全實現，也使後續的「歐洲貨幣體系」在體制設計上是相對受限的。第五，EMU 現今的樣貌－會員國願意將貨幣主權讓渡至歐盟層次，但仍不願意讓渡財政主權－反映了主要行爲者對於 EMU 以及歐洲統合的理解，此一不均衡的態勢固然反映現狀，但也可能是下一個轉折的發展方向。

從理論建構的角度來看，歷史制度論允許或含括不同層面的解釋項，諸如國際層次（「布列敦森林體系」的變遷、石油危機）、歐洲層次（關稅同盟以及「共同農業政策」），在分析單位上亦賦予非國家行爲者如執委會主席、科技官僚與央行官員等部分的解釋力。這雖然呈現出動態且多重因果關係的圖像，但也不免有流於敘述性以及主要解釋機制不明之虞（Schmidt, 2006: 106）。例如，馬斯垂克條約中關於 EMU 的設計，究竟是路徑依賴的歷史結構面向、或是不同的行爲者相互競爭、談判與妥協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果？

㈢國家層次

1. 自由政府間主義

國家層次的因素，考量的是國家的利益與議價能力，而表現在政府的行爲上。在這方面最主要的理論貢獻，是以 Andrew Moravcsik (1993; 1998) 爲代表的「自由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19] 簡單來說，自由政府間主義結合了國家偏好形成的自由主義式理論，以及國家間策略性議價的政府間主義。其理論主要分爲三個層次或階段：首先，國家的利益與偏好，是國內政治過程的結果，亦即不同的社會團體競爭政治影響力，在此過程中形成一組國家利益或目標；其次，當特定利益在國內形成，國家政府則將之帶到政府間的層次進行談判，由於各國的利益與偏好鮮少一致，談判是否有結果，或者政策協調或合作之後的利益當如何分配，即反映行爲者的相對議價能力；第三，當政府間的談判有了實質的協議，各國乃將主權的讓渡予超國家組織，以此相互控制或限制，從而提升國家間承諾的可靠性（Moravcsik, 1998: 3-10）。換言之，國家間的集體決策可以用每個國家先型塑其偏好、然後從事國家間協商、最後決定是否將主權讓渡予超國家組織的假設加以分析（Moravcsik, 1998: 473）。

Moravcsik (1998)以上述三個階段，分別檢驗英國、德國與法國在五個歷史時期－羅馬條約、共同市場、貨幣統合（包括「蛇形浮動機制」與「歐洲貨幣體系」）、「單一歐洲法案」與馬斯垂克條約－的各自考量。其指出，針對國家偏好的形成，在十五個個案中，每一個個案都有充分的證據支持，國家的行爲係出於政治經濟的考量。相對的，地緣政治的利益或意識形態，僅出現在八個個案中，且大抵是次要或平行於政治經濟的理由。因此，儘管他小心的指出，地緣政治的利益與想法不宜被完全排除，但這仍是次要的（Moravcsik, 1998: 473-479）。在國家間的談判方面，Moravcsik 的研究則指出，相對於超國家的政治行爲者，國家政府享有充

[19] （自由）政府間主義的歷史與論點，可參考 Rosamond (2000: 75-81, 130-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的資訊與概念，顯示出國家間的交易成本是極低的。相對的，超國家的政治行爲者(如狄諾)並不必然擁有好的資訊或想法，其促成整合的事蹟，也往往無法獲得證據支持（Moravcsik, 1998: 479-485）。最後，在主權是否共同使用（pooling）或讓渡上，技術專家的動機或國內的分裂與論述並無法獲得實證的支持。國家選擇進一步整合的原因，主要基於「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亦即認爲進一步的國家間合作將在特定議題領域帶來利益。僅有在實質的風險或決策後果不大的情況下，意識形態才會是整合的原因（Moravcsik, 1998: 485-489）。一言以蔽之，EMU 的發展，乃至於歐洲統合的結果，主要是國家基於經濟利益，小心計算後的結果。

2. 社會選擇理論

與自由政府間主義旨趣相近的，是「社會選擇論」（social choice theory）。「社會選擇」意指「有關於集合所有個人的偏好或價值，成爲集體、社會或國家的總偏好」，以歐元而言，則涉及「各會員國內部的偏好抉擇，同時也牽涉到各會員國之間的策略考量」（王啓明，2002：106）。該文先分析 EMU 在政治層面與經濟層面的整體利弊得失，再依據各國的脈絡與考量排列出個別國家對四個政策選項－EMU、EMS、並行貨幣，以及浮動匯率－的偏好順序，而得出十二個會員國裡有七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比利時、希臘）支持 EMU 通過、兩國（英國與丹麥）反對，三國（葡萄牙、愛爾蘭、盧森堡）有議價空間的結論（王啓明，2002：106）。在 EMU 須經所有會員國簽署始能推動的情況下，葡萄牙、愛爾蘭、盧森堡被推論爲將進行策略性投票，亦即在其要求獲得滿足之後，始支持 EMU 的成立；英國與丹麥雖不支持 EMU，但其偏好亦無法獲得其他會員國採納，因此其他會員國需有所妥協，而以賦予前者退出條款，並承諾後者可視公投結果而決定參與 EMU 與否，作爲換取英、丹兩國支持的條件(王啓明，2002：107）。

社會選擇論與前述 Moravcsik 的自由政府間主義頗爲相近，在 EMU 的解釋上，均從國家偏好的角度出發，探討國家在歐盟層次的決策立場，屬「由下到上」的途徑。在實證的分析上，王文探討十二個會員國的偏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奧地利、瑞典與芬蘭因加入歐盟時日尚短而未列入考量），在範圍上較 Moravcsik 聚焦於英、德、法三國爲廣。然而，或囿於篇幅之故，對會員國偏好的形成並未提供足夠的論證與資料支持，是不足之處。

自由政府間主義以及社會選擇理論均是以國家爲中心。由於貨幣整合的過程與不同時期的制度設計係以會員國爲決策主體，而「自由政府間主義依其假設，是無政府狀態下關於政府間決策的理論」（Moravcsik and Schimmelfennig, 2009: 73），其論點因而顯得十分有力。然而，將焦點放在政府間決策的過程，亦使自由政府間主義（以及相似的社會選擇理論）較無法關注其他的行爲者（如跨國家的社團組織）與整合面向（既有歐盟組織之間的互動與影響），亦無法賦予其太多的解釋力。

二、歐元歷史的解釋

本文在前言的部分曾指出，本文對於我們是否能直接、客觀的攫取歷史真實，持懷疑的態度；事實與理論總是相互建構的（Tooze, 1994: 63）。以此觀之，對於理論的評價，並不能完全以「史實」爲標準，因特定理論總有其據以形成並能解釋的事實依據，但亦有其忽略或不能解釋之處。在此觀點之下，將不同的理論解釋分成三個或多個層次加以整理，對於理論的比較、發展或評析上，有其意義。[20] 以下將分別說明。

首先，分析層次的途徑，提供了一個理解歐元歷史的「架構」。這個「架構」本身並非理論，因其包含諸多在後設層次並不相容的觀點。然而，它將不同解釋加以排序，而不同分析層次列出來的因素，都捕捉並組織 EMU 複雜歷史的某一部分。因此，儘管（或假設）客觀全面的歷史是不可得的，我們仍能藉由不同觀點掌握到的片段，拼貼出一個歷史的圖像。而隨著不同層次觀點的增添與修正，此一圖像也能更加豐富。[21]

---

[20] 本節的論點，受到 Steve Smith (1994) 以及 Walter Carlsnaes (1994) 在「結構－能動性」議題上的對話所啓發，惟二者似將該議題與分析層次視爲相同的概念。

[21] 事實上，在文獻中不乏有學者對層次進行更細緻的分類，並/或在每一個層次進行更詳細的探討。Sadeh & Verdun (2009: 288-293) 即另行區分國內層次，將利益團體、景氣循環、選舉、政黨政治等因素列入。儘管他們的結論指出，這些因素不能解釋 EMU 的形成，而僅有影響其進程的效果（也因而未列入本文的討論），但這些卻都指出，EMU 的成立與運作、甚至更廣義的歐洲經濟治理，仍有許多面向值得發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歐元與 EMU 的發展爲例，Henning 與 Andrews 分別指出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變遷，以及因全球資本流動而引起的互賴，這兩個體系與結構的現象，而這是主要的統合理論－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較少關注的（Rosamond, 1995；Webb, 1983）；Levitt and Lord 以及 Grieco 的分析，則將焦點由經濟面向帶回冷戰結束後，歐洲政治結構變遷的政治面向。其次，在歐洲層次，新功能主義指出貿易、「共同農業政策」、單一市場等發展或政策，功能性外溢到促成 EMU 的可能性；McNamara 的分析，提示了思想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也呼應了社會科學近年來對「概念」的重視；Verdun 的歷史制度論分析，則點出 EMU 在設計上的延續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對跨國家行爲者的重視和對歷史延續性的強調。最後，國家層次的解析，則再次提醒，歐洲統合的進程，總是涉及國家（尤其是大國）的考量與計算。這些都是歐元與 EMU 的（部分）事實，Sadeh & Verdun 的結論，「EMU 是歐洲回應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特殊回應，而此一回應方式之所以可能，則需從歐洲既存制度解釋；EMU 成立的動機源於法德兩國的協議與國家利益的平衡；國內的動機反映出機會主義的特色，因而不能解釋 EMU」，對此下了一個良好的註解（Sadeh & Verdun, 2009: 278；Sandholtz, 1993）。

第二，分析層次的架構，提供了評析特定理論、或比較不同理論的可能性。一個理論的優缺點，除了可從理論與事實的對應程度加以觀察、或由其內部的假設、邏輯與組織加以檢討之外，也可以由其他層次的觀點相對照。舉例來說，Moravcsik 的作品，在假設建立、資料收集以及分析上，十分嚴謹且具說服力（Puchala, 1999: 326-329）。一個考察其作品的可能性，便是由其他層次的觀點著手。Verdun 即以其親身訪查的資料指出，歐洲國家的工會以及歐洲層次的行爲者如「歐洲工會聯合會」與「歐洲工業與雇主聯盟」，在馬斯垂克條約協商之時，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試圖傳達其「在特定條件下，支持統合的深化」之訊息，而這點是 Moravcsik 以國家爲主體的分析架構無法處理的（Verdun, 2002: 27）。這當然不是說，Moravcsik 的分析因而就是錯的，本文的目的毋寧是指出，一個理論的限制，往往可由其沒有或無法關照的面向加以掌握。

此外，在不同理論的比較上，此一架構亦提供了實用的概念工具。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對「哪一個理論較能貼近事實？」此類命題時，我們或可將之轉爲「哪個理論可以允許或處理不同或更多層次的要素？」如此一來，在檢驗的過程中，並不是先標舉出可能有利於甲說的歷史事實，然後以之衡量乙說或其他，而是從每一個理論途徑的內部結構著手。舉例而言，以 Moravcsik 的自由政府間主義和歷史制度論相較，則前者在理論建構上不能賦予歐洲層次的行爲者或國際結構太大的地位，因爲如此一來將傷害其國家中心的假設，以及三階段論的因果關係。相對的，歷史制度論可將國際結構的變化視爲重要的制度脈絡，亦主張國家政府是眾多行爲者當中的一部分（儘管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在概念上能涵括的層次，以及據此能說明的「事實」，便較自由政府間主義爲多。當然，多並不必然就是好，歷史制度論爲此而付出的，便是理論「簡約」的代價。如前所述，允許更多層次的因素、更多行爲者的理論架構，固然說明更多「事實」，但也不免有流於敘述性以及主要解釋機制不明之虞。

第三，歐元歷史的檢視：理論或架構？由前述討論延伸的一個議題是，若發展或檢驗理論的目的，在於使理論與「歷史」或「現實」相契合，則當前沒有一個理論架構可以完全勝任：每一個觀點能解釋的面向與程度都不同；同時，也沒有一個理論能完全吸納其他理論的長處、或駁斥對它的批判。此一認知使得學者主張在理論發展上，當採「折衷主義」，亦即融合不同學派的見解。Verdun (2002) 將十三個統合理論依照其主要的解釋項分成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兩大「家庭」， 並攫取各理論的論點，以之解釋 EMU；相似的，Sandholtz (1993: 39) 亦主張，解釋歐洲國家對 EMU 的偏好形成上，宜瓦解（collapse）個別的觀點並整合之。

儘管此一折衷途徑能使描繪出來的圖像看似貼近現實，但由此得來的，或許僅是更多的資訊，而非知識。因爲折衷主義並非一個清晰且條理分明的途徑，而包含了不相容的觀點。以廚房的用具爲比方，不同的理論不能輕易的放進「果汁機」裡攪拌，而混成新的理論。然而，儘管個別理論不宜輕易連接成新的理論，它們卻能以「千層蛋糕」的方式，將繁雜的現象有組織地呈現（Carlsnaes, 1994: 281）。如前所言，本文主張分析層次的方式，能提供我們理解 EMU 議題的框架，惟我們不宜逕行把此一框架視爲一個適當的理論途徑；後者的發展，仍須在清晰一致的假設上，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步推演遞移。

肆、結　論

本文旨在探討歐元的歷史及其相關解釋。在不同理論文獻的基礎上，並依循歐盟的自我認識，將 EMU 的歷史分成三個不同時期加以組織。其目的不是提供一個完整客觀的歷史真實，而是試圖以此作爲檢視相關解釋的基礎。爲解釋 EMU 概念的出現及其在不同時期發展的樣貌，本文將既有的研究以分析層次的方式排列與呈現。這些多層次的因素說明了 EMU 牽涉複雜的面向與議題，無法用單一的理論架構來解釋。同時，分析層次的整理方式，亦有助於我們考察單一理論解釋，或評比不同的途徑。自然，理論的比較與分析，反映的不是其本身的優缺，而是我們重視的目的與價值（例如：事實的貼近或解釋的簡約）。本文亦指出，分析層次的方式，提供我們了解複雜現實的架構，但不宜因而主張折衷主義式的理論發展，因後者得出的或許只是許多資訊，而非經嚴謹過程生產出的知識。最後，本文以分析層次方式進行文獻的整理與討論，仍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更多層次因素的納入（如國內層次），以及不同理論的歸納與比較，仍有相當擴展與精緻化的空間。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王啓明，2002，〈歐洲聯盟政策制定過程之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41(5): 87-110。

王啓明、陳怡君、蕭倩琳，2009，〈歐洲與亞洲共同貨幣政策之發展：從比較區域研究角度分析〉，《全球政治評論》，25: 117-150。

王泰銓，1997，《歐洲共同體法總論》，台北：三民。

李顯峰、符　勇，2001，《歐元：誕生與發展》，台北：華泰。

李顯峰，2010，〈歐元與歐洲單一商品市場〉，「歐洲聯盟經貿政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術研討會」論文（5 月 14 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歐洲聯盟中心、東吳大學 WTO 法律研究中心、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

宋學文，2008，〈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及模型建構〉，《問題與研究》，47(4): 167-199。

沈玄池，1998，〈國際政經新秩序與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金融研訓季刊》，91: 14-24。

林欽明，1998，〈「歐元」經濟聯盟乎？政治聯盟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1(12): 89-93。

吳東野，1998，〈歐洲單一貨幣的前景－政治面的觀察〉，《經濟前瞻》，58: 46-49。

洪德欽，1999，〈歐元之法律分析〉，《歐美研究》，29(2): 171-272。

洪德欽，2006，〈歐元之國際經濟地位〉，《政治科學論叢》，29: 9-30。

施建生，2001，〈歐元的建立及其前途〉，《經濟前瞻》，76: 93-95。

張亞中，1998，《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

陳麗娟，2008，《歐洲共同體法導論》，台北：五南，三版。

黃偉峰，2000，〈「知識社群」研究取向如何應用在歐洲與東亞經濟暨貨幣整合？方法論的困境及其解決之道〉，《問題與研究》，39(5): 47-69。

劉復國，1998，〈歐洲聯盟創設單一貨幣之動向及政治經濟效應〉，《經濟情勢暨評論》，4(1): 1-19。

蘇導民，1999，《歐元誕生與金融市場：間論歐元誕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台北：中小企業聯合輔導中心。

蘇導民，2000，〈歐元誕生對美元之衝擊〉，洪德欽（編），《歐洲聯盟經貿政策》，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頁 49-75。

二、西文部分

Andrews, David. 1994.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te Autonomy: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udies Quarterly 38: 193-218.

Apel, Emmanuel. 1998.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1958-2002*. London: Routledge.

Carlsnaes, Walter. 1994. "In Lieu of a Conclusion: Compatibility and the Agency-Structure Issue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The EC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Europe*, eds. Walter Carlsnaes & Steve Smith. London: Sage, 274-287.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0. *One Market, One Money. (European Economy 44)*.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5. *European Economy* 59.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Delors Report. 1989. *Report o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C.

Dyson, Kenneth. 1994. *Elusive Unio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Europe*. London: Longman.

EEC Treaty. 1957. *EEC Treaty: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Rome, 25 March 1957)*. Brussels.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10.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 Frankfurt: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Spring 2002 – EU 15 Report (Eurobarometer 57)*.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One Currency for One Europe: The Road to the Euro*.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Fleming, Marcus. 1962.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9: 369-3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ieden, Jeffry & Erik Jones.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EMU*, eds. Jeffry Frieden, Daniel Gros, and Erik Jon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63-186.

George, Stephen and Ian Bache. 2001.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ieco, Joseph. 1995. “The Maastricht Treaty,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the Neo-Realist Research Progra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1(1): 21-40.

Haas, Ernst. 1958.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as, Peter. 1992.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1): 1-35.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5): 936-957.

Hay, Colin and Daniel Wincott. 1998. “Structure, 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46(5): 951-957.

Henning, C. Randall. 1998. “Systemic Conflict and Regional Monetary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3): 537-573.

Jachtenfuchs, Markus. 2001. “The Governance Approac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9(2): 245-264.

Jenkins, Keith. 1991.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Katzenstein, Peter J. 1978. “Conclusion: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95-336.

Levitt, Malcolm & Christopher Lord.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netary Un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Lindberg, Leon. 1963.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cNamara, Kathleen R. 1998. *The Currency of Ideas: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eunier, Sophie & Kathleen R. McNamara. 2007. "Making Histor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t Fifty." In *Making Histor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t Fifty*, eds. Sophie Meunier & Kathleen R. McNama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0.

Moravcsik, Andrew. 1993.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1(4): 473-524.

Moravcsik, Andrew. 1998.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ravcsik, Andrew & Frank Schimmelfennig. 2009.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eds. Antje Wiener & Thomas Die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67-87.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4): 475–485.

Padoa-Schioppa, Thomasso. 1994. *The Road to Monetary Union in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uchala, Donald. 1999. "Institutionalism,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7(2): 317-331.

Ringmar, Eric. 1997. "Alexander Wendt: A Social Scientist Struggling with History." I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Making?, eds. Iver B. Neumann & Ole Waever. London: Routledge, 269-289.

Rosamond, Ben. 1995. “Mapping the European Condition: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 391-408.

Rosamond, Ben. 2000.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Ruggie, John Gerard.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79-415.

Sadeh, Tal & Amy Verdun. 2009. “Explaining Europe's Monetary Union: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1(2): 277-301.

Sandholtz, Wayne. 1993. “Choosing Union: Monetary Politics and Maastrich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1): 1-39.

Schmidt, Vivien. 2006.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State: Theories and Issues*, eds. Colin Hay, Michael Lister & David Marsh.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98-117.

Schmidt, Vivien. 2008.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303-326.

Segers, Mathieu & Femke van Esch. 2007. “Behind the Veil of Budgetary Discipline: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Budgetary Rules in EMU and the SGP.”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5(5): 1089-1109.

Singer, Davi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1): 77-92.

Smith, Steve. 1994.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the New Europe.”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The EC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Europe*, eds. Walter Carlsnaes & Steve Smith. London: Sage, 1-20.

Tooze, Roger. 1994.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New Europe: 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oretical Audit of a Questionable Category."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The EC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Europe*, eds. Walter Carlsnaes & Steve Smith. London: Sage, 61-83.

Tsoukalis, Loukas. 1977.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Underhill, Geoffrey R.D. 2002. "Global Integration, EMU, and Monetary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tability Culture'." In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Euro: Europeanization, Variation, and Convergence*, ed. Kenneth Dy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1-52.

Verdun, Amy. 2000. *Europea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Market Integration: Perception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Basingstoke: MacMillan.

Verdun, Amy. 2002. "Merging Neofunctionalism and Intergovernmentalism: Lessons from EMU." In *The Euro: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and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d., Amy Verdu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9-28.

Verdun, Amy. 2007.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of the Road to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 Journey with Many Crossroads." In *Making Histor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t Fifty*, eds. Sophie Meunier & Kathleen R. McNama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09.

Webb, Carole. 1983.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ds. Helen Wallace, William Wallace and Carole Webb. Chichester: Wiley, 1-41.

Wendt, Alexander. 1991.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4): 383-392.

Werner Report. 1970. *Report to the Council and the Commission on the Realization by Stage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mmunity (Bulletin of the EC, Supplement 11, Doc 16.956/11/70, 8 October). Council and Commission of the EC.

Wight, Colin. 2006.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History of the Euro:

A Multi-Level Analysis

Jyun-yi Lee & Chih-mei Luo***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euro,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several perspectives that seek to explain that history. The euro is a result of various European attempts to bring about 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While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adoption of the euro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re are still heated debates as to what best explains the ups and downs of EMU.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uro, this paper proposes "level of analysis" as a useful framework to organize and evaluat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counts in the literature. Depending on the explanatory power given, the perspectives under review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at least three levels—international, European, and national. While these accounts may not be compatible in meta-theoretical terms, together they nevertheless constitute a fuller pictur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framework also allows theories to be compared not by certain "facts" that are not themselves neutral, but by the level(s) that each theory is capable (or incapable) of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Finally, while the fact that no satisfactory account is yet available leads some to argue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this paper nevertheless holds a more skeptical stance, arguing that what can be achieved might just be pieces of information, not knowledge.

Keywords: the Euro, EMU, Level-of-Analysis

---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isiajylee@ccu.edu.tw.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cmluo@mail.ntp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